



苏智良：研究历史笔尖脚尖齐动

■文/历史季采编团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 李云波 文汇讲堂 孔冰欣

198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当听闻一青年学者谈及“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民党的历史作用时，有与会老先生拍案呵斥，“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会后，著名历史学家戴逸、王桧林教授安慰略感失措的年轻人，“你说的是事实，无须惧怕”，使其备受鼓舞。

这位青年学者即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史学硕士苏智良，作为当时两名上海参会代表中的一员，其求实、敢言的真性情已初露锋芒。而他对抗战的始终关注，则可从研究课题中窥见端倪。无论是进行帮会史考证时闲话上海大佬为抗日出了多少力气，还是进行“慰安妇”历史真相挖掘时揭开日军“画皮”、帮扶受害者，苏智良承载老一辈史学家的激励，脚踏实地，笔走真理，惟愿自己的史学思考能填补历史记忆的盲点，对社会发展有所助益。

全家出动，全国范围内寻觅“慰安妇”幸存者；住过山西窑洞，也在云南翻过车……研究做得辛苦，但苏智良初心不改，“我这儿存有17大本账册，记录了十余年来社会各界援助慰安妇的具体情况，将来可以考虑捐给上海市档案馆。”

面对记者的好奇，苏智良笑言在他自费捐助的数万元费用中，已经很难分清是治学理念还是研究对象所牵动的社会责任所使……

师从刘惠吾和陈旭麓

率先踏足上海史系统研究

1977年高考恢复，在江西婺源插队的苏智良次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经做过稻田实验的他坦言，“我们青少年时代经历了社会剧变，从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再到高考的恢复，中国为什么会经历如此曲折的道路？未来将如何选择？”苏智良希冀能从史学研究中找寻原因和经验教训，“为了考上心仪的院校，我吃饭的时候都在看复习资料，当时条件艰苦，几乎顿顿烧茄子，以至于我回到上海后十几年里一吃茄子就反胃！”他笑道。

研究生苏智良先是师从刘惠吾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刘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在其指导下，苏智良完成了学生时代的首篇学术论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上海成立》，并发表在校历史系青年史学社1980年创办的学生刊物——《青年史学》上。而刘先生与陈旭麓先生是好友，一次两人散步，陈老感慨，“文革总会过去的，将来上海史研究很重要。”受到启发，刘惠吾先生于1980年代初踏足上海史研究。与此同时，苏智良埋头学习，与同学朱华一起，投入到《上海近代史》的编写工作中——这应当是新中国第一本上海史。

1985年1月，刘先生不幸病逝，苏智良转入陈旭麓门下。陈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以思辨和文笔见称，晚年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说”，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治近代史的分析框架。“我常到陈先生位于华师大二村22号2楼的家中请教问题，先生后来提倡社会史、会党史，我也是从那时起对社会史产生了兴趣”。苏智良回忆，史识是陈旭麓最为看重的治史素养，史识即观察力，同时“勿为传统思想及自己成见所蔽”。尽管跟随陈先生的时间较短，苏智良却也受到其治学理念的重要影响，为其上海史研究奠定了较高的方法平台。

涉足黑社会史、毒品史

紧扣社会焦点，填补学术空白

近代上海史上，有诸多特殊现象涌现，其后却是19世纪20世纪初门户开放与上海地方特色的交织所致，作为上海人耳熟能详，但作为学术研究却是空白点。苏智良的敏锐使他聚焦了黑社会史、毒品史研究领域并不懈地深挖，及时发挥了它们的史学价值



①2005年苏智良教授在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

②2001年苏智良与海牙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大法官合影

③1999年苏智良教授与《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女士在旧金山合影

④苏智良大学时代与党支部委员合影

和现实意义。

以黄金荣、杜月笙为代表的旧上海黑社会问题以前基本没有人进行学术研究，而这恰恰是上海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况且“国家转型时期，有组织犯罪会不断壮大，应该充分重视并亟待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本着这样的想法，苏智良1990年代初最早给“黑社会”一词进行了定义，并被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有组织犯罪时参考。而黄、杜等旧上海帮会“掌门”，亦非扁平的“流氓头子”式人物。上海世博会期间，央视纪录片《海上沉浮·黑帮》特邀苏智良担当历史顾问，该片一经播出便为人民津津乐道，不少认出“苏教授”的上海市民还会亲切地用沪语向他打招呼。“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宜全面理解剖析，尤应尊重史实。”在苏智良严谨的史学视域中，杜月笙的“三碗面最难吃”为百姓所熟记，而他抗战期间在共产党、国民党之间的斡旋，也使其丰富的面相为世人所知晓。

现实中，毒品对社会的渗透，也使得苏智良加快了学术研究的进程，以对治理提供及时的学术参考。1980年代中期，苏智良特别关注越发严重的毒品问题，广泛搜罗资料，多次到云南等地采访缉毒警察、吸毒者等，最终完成42万字的《中国毒品史》。1998年国家禁毒委员会主持禁毒缉毒战线的重要参考书《禁毒全书》，请苏智良任主编；2003年，上海成立禁毒社团——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苏智良承担董事一职至今；2009年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发起的百年禁毒大会在陆家嘴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苏智良应邀参会。在其眼中，“毒品”是全世界面临的棘手问题，经历鸦片战争之痛的国人更需反省历史阴暗面与社会病态，不断超越，战胜自身弱点。

揭露“慰安妇”血泪真相 学术研究渗透责任关怀

如果说，黑社会史、毒品史是开埠后上海土壤中

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2007年又设立中国“慰安妇”资料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慰安妇”纪念场馆。

“慰安妇”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使得苏智良的调查困难重重。“上海有一位受难者，周围邻居知道她曾经被强迫为‘慰安妇’，户籍警也知晓。我去采访她时，她就是不承认。”苏智良对此表示同情理解，意识到做口述实录务必强调关怀角度的切入等细节。而除了“慰安妇”自身的忌讳，外界阻碍也不少。2000年苏智良带领云南受害者李连春去东京作证时，地方政府横加阻拦，称“这么丢脸，还要去国外宣扬？”他带着幸存者到东京后更引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围攻，往往是会场内正义之声慷慨陈词，会场外右翼抱团集结，伺机挑衅。但是，苏智良“决不因此止步！”与以上困难相比，资金问题最实际。初期从事“慰安妇”考察时尚能勉强应付，但是自2000年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生活资助以来，每人每月资助由最初的100元增加到现在的400多元，且一些慈善爱心组织“后继乏力”，因此“慰安妇”研究中心常常“财政赤字”。不过，人间暖流仍在涌动，上海的一对老夫妇徐修国、曹慧缇，虽然平时出租车都不太舍得叫，却自2011年首次捐赠以来累计捐款53万之多，令苏智良十分感动。

随着调查工作的开展，一批关于“慰安妇”的学术著作相继面世，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二战中日本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性奴的有组织国家行为，无可抵赖”。2014年4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布最新89件日本侵华档案，进一步曝光日本强推“慰安妇”制度的卑劣残暴。在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苏智良也为“慰安妇”幸存者的申诉等矢志不渝地努力着。2000年12月6日，苏智良带团携10余万字的起诉书赴东京参加“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最终首席法官麦克唐纳宣判“日本当时的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犯有违反人道罪”，这桩诉讼无疑为中国“慰安妇”权益的争取打下了基础。

对“慰安妇”问题的系统研究离不开重要慰安所遗址的保护。“大一沙龙”原是苏智良研究团队穷20年之之力的“慰安妇”研究要点，2013年苏智良领衔的团队终于完成对该慰安所历史的系统调查，提交《保护世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报告》，呼吁“保存、保护‘大一沙龙’慰安所遗址”，最终得到上海市政府的认可并获得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同年，苏智良协助中宣部相继在云南和黑龙江建立“慰安所遗址陈列馆”。

2014年2月为了永久将“慰安妇”资料留存，苏智良在亚洲日军“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上呼吁将“慰安妇”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并得到国家支持，担任首席专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日本形成持续压力”。而《Chinese Comfort Women》在海外3个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外交部特意打电话给苏智良，向他表示了感谢。《金融时报》的记者用了半年时间打磨专题，为此书做了整版报道。

复原淡忘的上海人物

挖掘程子卿、推出饶家驹

生于斯长于斯的苏智良与上海这座多元文明的大都会有着不解之缘。1998年苏智良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从事“国际大都市比较研究”课题的学术交流，随后，他在180万字的《上海城区史》中对外滩、城隍庙等多个城市空间的地理方位、居民身份、职业构成、工商分布、风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令学界耳目一新。

针对城市发展建设中出现的功利化、单一性等问题，苏智良呼吁“应将已消失或即将消逝的城区风貌、人物、民俗等记载存史”，先后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上海历史人文地图”（下转第3版）